天宝战争：云南少数民族融入中华文化的关键转捩与历史新篇开启

张晗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云南昆明　65000）

摘要：云南在历史上长期处于中原文化体系边缘，天宝战争成为其融入中华文化的关键转折点。本文以历史文献为研究基础深入剖析天宝战争对南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揭示这场战争如何开启云南少数民族融入中华文化的进程，为研究民族文化融合提供重要历史依据。

关键词：民族融合；天宝战争；南诏；吐蕃

一、引言

云南又称“滇”位于中国西南边陲，参照李中华先生《中国文化概论》的中华古文明三大文化圈，以中原文化为主干的中华文明体系中的表述，云南一直作为“蛮夷”在很长时间内独立于中华文明体系之外。其独特的地理风貌的格局，包括高原、多山等地形特征，以及众多骁勇少数民族聚居和瘴气等环境因素，使云南在古代历史记录中较少被提及。

尽管在行政管辖层面，夏、商时属梁州，殷周时为“百濮之国”，但古中国时期中原政权对其实际统治效力是十分有限的。直至公元 3 世纪依照《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滇王尝羌降于汉，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这片 170 万年前就有古人类居住的土地正式开始进入中华文明的文献记录中。

公元 3 世纪左右云南地区内建立稳定的少数民族政权后不论因为地域原因或民族原因，一直是游离于中原统治及中原文化之外。而让云南地区这片“化外之地”全面融入中华文明的重大事件正好发生于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所论述中华民族主体自发自觉的联合阶段，发生在唐朝天宝年间（755–763 年）唐王朝、吐蕃、与南诏之间的大战：天宝战争。

二、天宝战争的背景与起因

当时，统治云南地区的政权为南诏国。

南诏国是西南地区一个古老的国家，依照《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文献记载南诏源自彝(y í)族和白族的先民在今云南洱海一带建立了六个政权，称为六诏，在隋唐时期六个政权区域稳定平衡的状态在开元年间被打破，受到唐王朝的支持的南诏蒙舍诏首领皮罗阁驱逐河蛮、兼并五诏，于开元二十六年（738 年）受唐册封为云南王，建立南诏政权，《新唐书》记载：“当是时，五诏微，归义独强，乃厚以利啖剑南节度使王昱，求合六诏为一。制可。”

当时亚洲大陆的版图上大唐、吐蕃、突厥作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实力最强盛的三个大国之间长期敌对，互相之间战争不断。同一时期在大国版图交界区域的小国为了维护政权需要反复在大国之间选择结盟或者宗主以求得暂时的安稳，在这一条件下，地域与大唐与吐蕃均接壤的南诏国成为了大国间的博弈之地。天宝战争正是爆发在这一大背景下。

天宝战争爆发于公元 750－755 年，白居易《新丰折臂翁－戒边功也》的对这场战争有过如此描述：“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该战争的起因按照《南诏德化碑》记载，是由于当时南诏的统治者受到源自唐朝地方官员极大的侮辱，因此被迫叛乱。同期的唐王朝史书记载是因南诏当时统治者在唐帝国和吐蕃之间反复横跳，最终触怒唐帝国遭到讨伐。至于天宝战争的爆发的真实成因非本文所关注的内容，因此不做详考。

三、天宝战争对南诏的整体影响

天宝战争作为一场双方死伤无数冷兵器时代的残酷战争，对南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政治影响：战争结束后南诏与吐蕃结成紧密联盟，为南诏后续的发展争取到了时间和空间。但这一选择使了南诏与唐朝的关系恶化，加剧了南诏与唐朝的矛盾。并导致吐蕃在结盟后期对南诏的强盘剥，成为诱发南诏后期政治策略主动转向唐朝的重要原因

经济影响：南诏与吐蕃在天宝战争期间形成的关系，令南诏得到了吐蕃的一定经济支持，这有助于南诏在战争中维持自身的经济实力，并使得南诏与青藏高原以及面向以骠国为代表的东南亚地区之间的商贸活动得以增强，为后世的茶马古道商贸活动做好的铺垫。

文化影响：南诏在战争中选择了吐蕃，强化南诏与吐蕃文化的交流，同时由于南诏作为战略缓冲地区，为了保留向唐帝国求和的机会并未对唐帝国进行对断裂切割，还对战争俘虏给予了优渥的待遇，反而与中原文化有了更加密切的联系。本文将重点阐述此单元的内容。

四、天宝战争对南诏的文化影响

其一：加速南诏对中原文化的系统学习

天宝之战的唐朝俘虏中，唐朝人郑回是任嶲州（今四川西昌）西泸（今四川西昌南）县的县令，当时南诏统治者阁罗凤发现其乃饱学之士，于是很看重这名俘虏。

当时的唐帝国作为真正的世界第一强国(唐朝存续时间为：公元 618–907 年，存续 289 年。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大国分别为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帝国、印度河流域的戒日帝国以及亚欧大陆交界处的拜占庭帝国又称东罗马帝国，从人口数量；统治疆域；经济体量等方面综合评估，唐帝国排名第一）对于周边国家的吸引力是非常巨大的。

郑回作为唐朝典型的儒家学者深受南诏统治者器重，担任凤迦异、异牟寻、寻阁劝三代南诏王室子的老师，这几位南诏的统治者自幼接受儒家老师的教育，使得整个南诏国不论是从显性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宗教呈现，到深层次的文化心理认同等多方面，开始呈现一种自上而下的中原化、儒学化形态。

其二、加深南诏对民众慕唐的意志引导

南诏对中原文化认同的显性例证还包括体现在其本土宗教本主崇拜领域。“本主”，其原义为“方主”，即“以村社为单位集体荣拜的社神”，本主享有庙宇供奉与香火祭祀。通常一村敬奉一位本主，亦存在一村敬奉多位或多村共奉一位本主的情形。本主神多为本土传说中的英雄形象，他们或与民为善、或斩妖除害、或为保卫乡土而英勇奋战。

位于洱海边大理市凤仪镇大江西村的本主竟然是天宝战争中的唐军将领赵元勋、赵元德、赵元臣三兄弟，三位唐军将领本主的祭祀与其他村落不同，其是夜晚迎接本主，由村中福泽深厚的老人模拟本主当年统领的部队将领抬旗，当年结婚的新郎负责抬神轿，寓意求子求福。神轿绕村而行，沿途设火堆迎接，至村头时举行接水仪式以祈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由此可见，当地村民并不将这三位唐军将领视作侵略者或敌人，反而敬仰其英勇善战、兄弟情深等品质，对他们客死异乡满怀同情，甚至认为他们可庇佑村庄免受邪物侵扰。若非南诏对唐文化已高度认同，其统治者恐难以容忍此类本主崇拜现象，纵观世界历史，将敌对国将领尊奉为神进行崇拜的情形实属罕见。

南诏作为本土少数民族政权，原本处于中华文明体系之外，历经漫长岁月才逐步融入。天宝战争在这一融合进程中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此融合过程具有双向互动性，例如著名的《南诏奉圣乐》入长安，为中原汉族文化融入诸多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元素，且该乐舞后成为唐朝 10 大国乐的经典保留曲目 。

五、天宝战争成为南诏融入中华文化的序幕

唐帝国在历经安史之乱后，统治秩序逐步恢复，虽国力较开元盛世有所衰退，但依旧是同期世界首屈一指的强大帝国。南诏六世王异牟寻自幼受唐朝儒家学者郑回教诲，对唐朝怀有深厚情感与文化归属感。从客观层面审视，吐蕃文化以游牧文化为主，而唐文化系更为先进的农耕中原文化，对于南诏统治者而言，高层次的中原文化更有利于推动国家长远发展。尽管当时吐蕃因安史之乱而军事实力稍强于大唐，但基于文明演进大势与国家发展战略考量，中华文明对南诏具有难以抗拒的强大吸引力。

多民族之间能够最终走向融合是需要较长的时间，它必须是基于地域接近、文化之间的基本认同，还必须包括战争的催化剂。由黄朴民、白立超、熊剑平撰写的《改变历史的 24 场战争》中就明确提出战争具有两面性的观点：战争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带来了破坏使生灵涂炭、财富毁灭、文明受损；另一方面，它又以特殊的方式和巨大的能量，打破旧有的秩序，为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开辟了道路；一些战争促进了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之所以界定天宝战争是云南地区少数民族正式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组成单元室基于以下史实，在战争结束后的 50 年后，贞元年间，南诏六世王异牟寻与唐朝使者会盟于点苍山，向南诏立下庄重誓言：“愿归清化，誓为汉臣，永无离贰”。此会盟标志着南诏与唐王朝关系的根本性转变。

贞元十年（公元 810 年），南诏奉圣乐入长安，这一标志性事件宣告曾作为外邦的云南地区少数民族政权正式融入中华多民族大家庭，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员，开启了云南少数民族全面深入地接受中原文化熏陶、与中华文化深度交融共生的崭新历史篇章。

六、结论

天宝战争在云南少数民族融入中华文化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开创性意义。它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度深刻重塑了南诏的发展轨迹，通过一系列复杂而深刻的历史事件与文化交融互动，为云南少数民族全面融入中华文化奏响了激昂的序章。

这一历史进程不仅彰显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的强大凝聚力与包容性，也为后世深入探究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规律、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内在机制以及地缘政治与文化互动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历史范本与学术研究资源，对深入理解中国民族融合的历史脉络与文化内涵具有深远而持久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李中华.《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版社.

[3]《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3]《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七）.

[4]白居易.《新丰折臂翁・戒边功也》.

[5]《南诏德化碑》碑文.

[6]黄朴民、白立超、熊剑平.《改变历史的 24 场战争》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

张晗，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化产业策划、版权保护、文化产品研究

基于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撰写 项目编号：2022J1114